

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

论清初贰臣和遗民交往背后的士人心态

白一瑾

摘要:清初失节仕清的贰臣士人,往往热衷与守节不仕的遗民文人往来,其原因是出于忏悔赎罪,寻求心理安慰,与借助遗民文人的声望改善自身舆论压力。在交往中,他们藉由对昔日友情的追忆和明朝故国的怀恋,寻求双方共有的情感交汇点,并知趣地保持忏悔与自惭的身份立场。而遗民对其态度亦较复杂,谴责其失节、与其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也有各行其志的宽容友好态度。

关键词:清初;贰臣;遗民;交往

清初的贰臣,是已经在明朝出仕为官,又在明清易代后再仕于清朝,因而违反了儒家君臣伦理道德的士人。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士人群体,他们具有相似的性格弱点,面临着同样的人生困境,因而形成了本群体独有的心态特征。他们与那些身处草野而拒食“周粟”、坚不仕清的明遗民的交往,即颇可展现出这一士人群体所特有的复杂心态。如果简单地依据各自政治立场和道德人格来评判,屈膝改节、再仕异族的清初贰臣,与坚守臣节、不仕新朝的前明遗民,本应属于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阵营,界限分明如天壤冰炭,其间根本不该也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然而,明清之际有些在后世“臭名昭彰”的贰臣,却颇为热衷于结交遗民,且与遗民建立起了相当密切而融洽的交往。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其中折射出清初士人群体的心态,也更加耐人寻味。

一

清初贰臣结揽遗民的心态是颇为微妙的。在文化传统方面,“养士”的行为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贵族网罗人才、广招宾客的流风余绪,也有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在起作用。士人由一介寒门子弟而登龙门、任显职之后,更愿意大力结交并且资助供养尚未成名的寒士,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制高点。清初此种风气,在庙堂显贵中颇为盛行:“其时居高位者,皆称好士。逸民野老,常与黄阁均礼数。”^①

而对于身仕两朝的清初贰臣群体来说,他们对不仕清廷的遗民士人的着力结交,则更能体现出这个士人群体独有的心态与需求。

由于自身改节再仕,且仕于异族政权,背弃了明朝故国和以“君臣之义”、“华夷之辨”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贰臣士人必然面对来自社会普遍舆论的道德谴责压力和自我内心忏悔自责的道

收稿日期:2011-03-27

作者简介:白一瑾,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博士后,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①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62页。

德拷问。而那些忠于故国、大节无亏的明遗民,正是他们所背弃的故国和伦理道德的象征。所以,他们一方面在遗民面前深觉有愧、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却又在潜意识中,对遗民存有崇拜和亲近之感。和遗民的交往,也就成为他们进行忏悔与赎罪、弥补自己破碎毁裂的人格心态的方式。

陈名夏与方以智在明朝时即有极为笃厚的交谊,鼎革后,陈名夏仕清,而昔日友人方以智成为遗民。陈写道:“缅怀我良朋,风波各岐路。龙眠方子贤,弃家天末去。归来诵华严,安心一缁布……四子天下英,各向山林住。敦怀抗尘俗,矫节发渊虑。念我流离人,慰言尚如故。”^①是时方以智已然剃度为僧,宁入空门而誓不仕清。陈名夏对友人“敦怀抗尘俗”坚贞志节的崇敬,对自己身为“流离人”失节仕清的自惭形秽和真挚忏悔,都表达得相当充分。陈在职时颇有出力乃至冒险保全遗民友人的行为,如遗民陶汝鼐“顺治十年,罹叛案论死,陈名夏密嘱洪承畴宽之”^②,又何尝不是来源于忏悔赎罪的心境。龚鼎孳对明遗民“倾囊囊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先后救援因参与反清活动而罹祸的陶汝鼐、傅山、阎尔梅等遗民,亦不乏此种赎罪心态。他在顺治七年给吴伟业的信中写道:“……且身既败矣,焉用文之?顾万事瓦裂,空言一线,犹冀后世原心,宣郁遣愁,亦惟斯道。”^③钱谦益与明遗民的交往,更是建立在共同参与反清斗争的基础上,以弥补自己一度降清失节的过失。“时桂王立于粤中,瞿式耜为大学士,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舟师纵横海上,谦益皆与之通”^④。在他失节降清后,尚与他保持密切往来的遗民,若黄宗羲、归庄、邓大临、吕留良等,大多和他共同从事过反清活动。

对于占据了社会道德制高点的遗民群体来说,他们的接受、谅解和同情,对于道德压力巨大的贰臣群体,是相当重要的心理支持和抚慰。以龚鼎孳为例,他在《与纪伯紫》中写道:“铜驼萧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胜林惭涧愧之至。悔此小草,困倍飘蓬,惟时咏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句,以自愧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时能去于怀。尘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⑤身为贰臣如飘蓬小草的他,在心理上时常倍感凄苦,但来自遗民“同心人”的深挚友谊,却能部分地缓解心理上的不能承受之痛,“自广绝交论,全高处士评”^⑥、“诸子狂相得,深宵语更温”^⑦,遗民友人们显然不因他的贰臣身份而排斥他,这使他负罪感浓重的心灵倍感温暖。

吴伟业被迫仕清后,精神状态相当颓唐苦闷。是时客居在京的遗民胡介,在《与吴骏公先辈》的信件中记载道:“昨坐对竟日,见先生神意不佳。”胡介与吴伟业友情深笃,深知其心境之苦,故请吴“善为眠食”,并以佛学观点为吴安慰排解道:“五浊亦名缺陷,既落世网中,顺行逆行,冷暖自喻,要之古庙香炉,酬偿本愿,我辈唯以不负三生为大耳……从来慧业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相未净,转展迁流者,故世遇率坎坷多故,正以发其回首拂衣也”^⑧。

好士养士,特别是资助那些以节操自许的遗民士人,可以藉此弥补和重塑自己破碎毁裂的人格形象。明遗民虽然身处草野,却因其大节无亏、占据道德制高点,而能引导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他们对于某一贰臣士人的良好评价,甚至可以改善和消解其人因失节而在士人群体中产生的负面印象。这正是清初贰臣乐于与明遗民结交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钱谦益在南京降清后,名声扫地,为江南士人所不齿,但其顺治五年因资助黄毓祺复明活动而

① (清)陈名夏:《石云居诗集》卷六《怀方张沈梅四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186页。

③ (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39页。

④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306-307页。

⑤ (清)周亮工:《尺牍新钞》,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217页。

⑥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一四《古古仲调饮中同和蜀道诸诗韵》,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三三《又和孝威元字韵》。

⑧ (清)胡介:《与吴骏公先辈》,(清)周亮工辑:《藏弃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牵连入狱,遗民人士林古度、盛斯唐、何焯感其苦心忏悔,前来看望,且为其狱事四处奔走。这几位声望颇高的遗民人士,对钱谦益的同情态度,无形中带动了整个江南遗民群体对钱谦益态度的转变。此后,不少遗民人士纷纷登门慰问示好,钱氏本人在《新安方氏伯仲诗序》中回忆道:“戊子岁,余羸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偕行相慰问。桐皖间遗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时过从……再过金陵,乳山游迹益广。都人士介乳山谒余者,名纸填门,诗卷堆案,翰墨淋漓,长干传为盛事。”^①与顺治三年钱氏回乡时“风闻吾邑物议,大以不肖为射的,标榜士论者,与挟持宿怨者,交口弹驳,体无完肤”^②备受排斥的处境相比,钱谦益周遭的舆论环境无疑是改善了许多;而他与林古度等遗民的一段因缘际会,正是他处境改善的直接契机。

清初许多贰臣士人,都因与明遗民的交往,在当时声名颇为不恶。周亮工“好士怜才,一时遗老多从之游”^③。王崇简“喜与诸名士游,故其出处,人颇谅之。顾炎武择交最严,独许为有心人;申涵光称其古道”^④。曹溶则号称“边郡诸侯谁好士?云中雁门称第一”^⑤。足见周亮工、曹溶、王崇简等人的乐于提携士人,以及这种好士之名,能够让世人部分地原谅他们在出处方面的选择。

龚鼎孳在这方面更有代表性。他降闯仕清、臣节丧尽,却在清初士林中名望甚高,著名的遗民人士杜濬甚至认为:“出处之道,处以为身,出以为民而已。求之当世,处以为身者当如宣城沈耕岩先生;出以为民者当如合肥龚芝麓先生。”^⑥另一位在江南声望颇高的遗民顾景星,则在康熙三年所作的《沈友圣随西轍北上登舟索赠走笔兼柬西轍并上龚公》中明言:“人伦藻鉴澁阴持。”^⑦这位本该是声名狼藉的贰臣,当时之所以会有如此高的声望,正因他与余怀、纪映钟、冒襄、杜濬、顾梦游、顾景星、方文、阎尔梅等多位江南遗民领袖人物的交谊笃厚,“以好客故,为士流所归”^⑧,颇得遗民士人的好评。

二

贰臣与遗民的交往过程中,双方往往在精神上能够寻找到相同的情感交汇点,这就是对于在明朝时已然建立起的深笃友情的回忆,对于已然逝去的明朝的怀恋之情,以及作为历史巨变幸存者的心境。

王泽弘在《北游草序》中,对遗民人士方文在鼎革后仍与众多仕清者保持交往的原因有所分析:“所谓公卿大夫,皆先生向时风雨寤寐、数十年不渝之交。如其仕隐殊途,遂欲与数十年朋友之交绝,其于诗人忠厚和平之意远矣。”^⑨双方的友情纽带并未随着朝代更迭和彼此政治立场的变化而改变,而是在新王朝延续了下来。

明清鼎革的时代剧变,山河易主、国破家亡,明王朝黯然谢幕,入主中原的又是为汉族士人所鄙视的满清异族政权,无疑给生存于这一时代、从兵戈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士人灵魂留下了巨大的创伤。黍离之悲、家国之思因此而成为清初一段时间内普遍的社会思潮。此种贰臣与遗民共有的心态,也可以部分地泯灭双方在名节立场上的巨大鸿沟。

① (清)钱谦益:《有学集》,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② (清)钱谦益:《牧斋外集》,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823页。

③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889页。

④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611页。

⑤ (清)俞汝言:《二子篇贻顾宁人先生》,《俞渐川集》,清师竹斋钞本。

⑥ (清)杜濬:《变雅堂文集》卷五《送宋荔裳之官四川按察使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 (清)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一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⑧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553页。

⑨ (清)方文:《奩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36页。

龚鼎孳在鼎革后,曾有《怀方密之诗》寄怀遗民友人方以智,在长达千字的序文中,一一回忆历数了两人自明朝起,历经的党祸鼎革诸般劫难,和“始终交谊患难不渝”的友情。其诗云:“修竹墙阴爱结邻,十年缟带奉清尘。天移忍复论交道,剑在何堪拟故人。”“他年执手三山岛,共数铜驼陌上愁。”^① 纯然是将自己和方以智都当作历经沧桑浩劫的幸存者看待,不存在遗民与贰臣之分。

更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顺治四年冬的半塘之会。此次相聚于虎丘半塘舟中的唱和,参与的五人中,龚鼎孳和曹溶是贰臣,姜垓、顾景星、周世臣则均系遗民。龚鼎孳有“乱离犹喜赋灵光,黄鹄风高泪几行。击筑音难忘易水,过江潮已咽钱塘。吴宫金粉樽前出,汉苑铜驼别后荒。谁唱乌栖城上曲,苏台一夜月如霜”^② 句,曹溶则写道:“漫有客心愁岁暮,能忘国事仅生还。眼中京洛交游在,酒醜逡巡润玉颜。”^③而顾景星则写道:“寒泉虎气多年散,别苑鸡陂历代荒。如此江山供一醉,屐声归踏白堤霜”,“乱余风景无多异,坐上何人最艳颜。”^④ 显然,江山易主的沧桑之感,以及度尽劫波后仍然存留着的深挚友情,是遗民与贰臣共有的,也是最能激起双方心灵共鸣的内容。

不过,虽然故国之思是贰臣与遗民交往中,最能激起双方内心共鸣的内容,特别是能够令遗民动容的部分,但双方内在的精神人格、人生指向,以及对于明朝故国怀恋的程度深浅,都有相当大的区别。与遗民真纯深挚、不加掩饰地表达对明王朝的怀念和对明朝君主的忠诚相比,贰臣的内在情感就复杂得多:他们既有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对故明王朝的真实怀恋,但在抒发时也必须要把握和切合自己当下作为新朝臣子的身份而不能越界;由于种种实际的原因,他们对明朝的感情和反思往往更为复杂,并非纯粹的忠诚与追怀,但又要顾及遗民友人的感情,而须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有节制的、有时甚至是表演性的抒发。

以龚鼎孳为例,他与众多明遗民交谊笃厚,其《定山堂诗集》中亦颇多与江南遗民的唱酬。但其中即存在一个令龚氏绕不开的麻烦:江南遗民对建立于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普遍感情相当深厚,甚至将其视为明朝灭亡的象征,作为故国之思寄托的直接载体,在江南遗民群体的心目中具有颇为神圣的意义。但对于龚鼎孳来说,虽然他对甲申明朝灭亡有缱绻不舍的故国之思,但对弘光政权却并无半分感情眷恋,更何况南明朝廷还一度欲追究他“降贼”的罪行。因此,他在与江南遗民唱和时,虽然较频繁地提及南明的覆亡,但若“新亭杯酒后,哭叹已无人”、“关河王气外,落木浩无边”^⑤ 等,都是较为空泛的、一般化的应酬之作,故国之思并不十分浓烈。偶尔流露出的一点对南明覆亡的伤感,如“百年唯旧雨,六代此重阳”、“时容歌当哭,吾敢醒而狂”^⑥、“多少斜阳城阙外,酒痕吹落蒋陵秋”、“可怜九子风铃响,尚许啼鹃带血听”^⑦,也只略具亡国感慨的风味而已。和遗民人士同类作品相比,其中情深情浅,不言而喻。

在与遗民交往的过程中,由于双方人格高下和节操有无的对比,绝大多数贰臣在心理上都有潜在的道德自卑感和负罪感。而此种自责心境,在面对着入清后大节未堕、遗民终老的昔日友人时,也就更为强烈。因而,在同遗民的交往中,关于出处问题之“悔”,是贰臣们时常强调的一个重要主题。

以钱谦益为例,他与林古度的唱和中,如“覆杯池畔忍重过? 欲哭其如无泪何”、“故鬼视今真

①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一七《怀方密之诗》。

②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一八《如须邀同秋岳颖侯赤方半塘舟中限韵二首》。

③ (清)曹溶:《静惕堂诗集》卷三〇《如须招同芝麓颖侯赤方半塘舟中限韵二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 (清)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六《姜如须招同合肥公曹秋岳周隐侯半塘舟中限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⑤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八《长千秋兴》。

⑥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二《九日邀赵洞门友沂陈涉江张紫淀何寤明宋又韩邢孟贞杜于皇邓孝威纪伯紫余澹心白孟新仲调姚寒玉登容与台》。

⑦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四〇《九月一日同澹心伯紫筠季寒玉子翥杓司家弟孝绪并一指山语二上人登雨花台四绝句》。

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风轮火劫暮年过,未死将如朽骨何”、“辽鹤定知同伴少,楚囚刚道一身多”^①等等,都充满了慨叹自己失节铸错、内心悔恨惨痛无家可依之言。而作于顺治五年秋的《题曹能始寿林茂之六十序》,此种情绪即体现更为充分。他思及曹学佺以身殉明,林古度全节不仕,自己却大节尽丧,其悔恨自责、自惭形秽的贰臣心理显露无遗:“能始为全人以去,三年之后,其藏血已化碧。而予也,楚囚越吟,连蹇不即死。予之眉目蹇笑,临流览镜,往往自憎自叹,辄欲引而去之。”^②被迫仕清而痛悔一生,临终尚叹息自己“纵比鸿毛也不如”的吴伟业,在与未仕全节的故人相逢时,心理的自卑自遣就更加强烈。《寄房师周芮公先生四首》是他为当年中举时的座师周廷铨所作,他回想起自己“负耒躬耕,誓终没齿,不谓推迁尘事,潦倒浮生,病苦穷愁,羸靡煎迫”,终于改节仕清、遗恨终生;而“师以同征,独得不至,方推周党,共羨管宁”,得以完名全节。尽管他也为自己被逼不得已的处境辩解:“但若盘桓便见收,诏书趋迫敢淹留?”但这仍然无法平息他以失节丧名之身面对昔日座师的自惭形秽。他叹息“惆怅平生负所知,尺书难到雁来迟”,“巨源旧日称知己,误沾名贤启事中”^③,将自己喻为改节负友、骂名千载之山涛,内心之凄怆愧悔,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贰臣们也只有尽量诚挚乃至夸张地表现出内心此种自我谴责的痛悔情绪,方能得到遗民友人的同情谅解。因而他们在遗民友人的忏悔,实在不乏有意表演的意味。

以龚鼎孳送别昔日友人姜琛的《如农将返真州以诗见贻和答二首》为例,此种半吞半吐、真情发露和有意表演杂糅的复杂特色,表现得尤为鲜明:“天涯羈鸟共晨风,送客愁多较送穷。黄叶梦寒如塞北,黑头人在愧江东。九关豺虎今何往,一别河山事不同。执手小桥君记否,几年衰草暮云中”,“曾排阊阖大名垂,蝇附逢干狱草悲。烽火忽成歧路客,冰霜翻羨贯城时。”^④姜琛在明朝时曾和龚鼎孳同朝台垣,司职谏官,明亡后坚守臣节、终身不仕清。龚鼎孳回忆起两人昔日“蝇附逢干狱草悲”,因上书净谏而同时入狱,此时却“烽火忽成歧路客”,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眼下两人的生存立场已有天壤之别,其复杂心境可以想见。龚鼎孳只能竭力表白对自己当下的生存之“愧”,以期取得姜的谅解;而对于故国沦亡之惨痛,也只能仅限于咒骂大顺军队为“豺虎”,对满清的鸠占鹊巢却只能半吞还吐地叹息一声“一别河山事不同”。贰臣与遗民彼此立场的微妙尴尬,尽在其中。

因为名节有亏而导致的自惭形秽之感,贰臣在与遗民交往的时候,大多将自身的立场摆得比较正,恪守自己那并不光彩的身份,自动和志行高洁的遗民群体划开距离,尽量避免一时忘形而引起遗民的反感。

龚鼎孳与相当多的江南遗民如杜濬、余怀、纪映钟、邓汉仪、胡介、万寿祺、王猷定等都有比较深的交情,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一直掌握着此间的分寸,在交往中对彼此道德身份采取严格的区分态度。如《季夏集万年少隰西草堂》,注云“同祖命于一伟南阶六愚山诸子赋”,此次聚会在著名遗民人士万寿祺的住所,出席者又有唐允甲、王猷定等,显然是一次遗民聚会,所以龚才在诗中言“蓬蒿风日异,处士系前朝”,“嵇阮能留晋,巢由独遣尧”^⑤。在另一次集会上,龚鼎孳作有《秋杪集澹心道归堂时园次自广陵澹心自姑孰至》,其时在座者有余怀、唐允甲,甚至还有著名的江南遗民领袖林古度(注云:“时林茂之前辈在座。”),除了龚氏本人以外,几乎可以说是一次江南遗民聚会。诗中,龚鼎孳很识相地严格将自己和遗民们区别开来:遗民们所谈论的是“遗民皓发贞元事,暮雨台

① (清)钱谦益:《有学集》,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21-24页。

② (清)钱谦益:《牧斋外集》,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844页。

③ (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第416-418页。

④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一八。

⑤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三三《季夏集万年少隰西草堂》。

城古帝都”,而自己则是“九月菊因彭泽放,十围树到子山枯”,故此只能是“啣杯闽楚关河集,握手乾坤忧患殊”^①。字里行间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龚在咏叹遗民们的林泉生活时,绝没有敢把自己算进去。在龚鼎孳所留下的和遗民的唱酬诗作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遗民通常是以历代之高人隐士若夷齐、嵇康、管宁等典故指代,而指代自己的却是江总、庾信等失节者的形象。若《和答澹心兼寿其五十初度》:“我诚逊巨源,君亦薄嵇康。投书匪绝交,抽毫赋淋浪。”^②以山涛自喻而以嵇康喻余怀,一见出二人友情深笃,二也体现了龚在和遗民人士交往时,始终把自己的身份位置摆得很正。顺治十三年龚氏受命使粤,在岭南会见已经更名为澹归、出家为僧的遗民金堡时写道:“清言捉尘陪支遁,白首还家笑总持。”^③前句“支遁”指澹归,后句则显然以江总自喻,其彼此身份强调得很端正。

这种亲密而尚不至于“无间”,自觉恪守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声名的交往底线,在其他贰臣和遗民的交往中亦有所表现。若梁清标与遗民申涵光交往,曾有《送申凫盟还广平》高度评价申的忠义传家、遗民气节,以及诗文成就,看似其情融融,其末却云“王褒千载泪,沾洒向秋原”^④,很显然是以再仕之王褒自喻,把自身位置摆得很正。

三

从明遗民的立场来说,遗民对于如何看待贰臣的失节问题,其真实态度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坚持忠于故明,义不仕清,是他们生存的道德底线,也是建立本群体心理认同感的基石。因而他们对于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能坚守臣节、改变了政治立场的人,必然在心理上具有近于本能的鄙薄排斥。态度较激烈者,甚至坚决拒绝与贰臣的任何往来。若遗民彭士望“所交多士夫中有高行者,钱谦益、吴伟业降清,即断往来”^⑤。遗民汤燕生“龚鼎孳尝通书问,诗以招之,弗应又弗答,其介特又如此。”^⑥遗民方文与贰臣陈名夏交往中的一段公案,亦颇有代表性:“陈溧阳以假归,乞龛山定其诗,执礼甚恭。龛山反复读之,曰:‘甚善,但须改三字,即必传耳。’陈以为隐也,曰:‘宁止是,顾三字者,何也?’龛山厉声曰:‘但须改陈名夏三字!’时坐客满举,错愕不能出声。”^⑦

不过,面对面的激烈斥责奚落,立场鲜明的直接冲突,只是其中比较少见的极端事例,遗民对待已成贰臣的友人,更多的则是在日常交往中夹杂的鄙薄与惋惜、谴责与理解相交融的复杂情绪。

阎尔梅和钱谦益在明亡后的交往,颇为耐人寻味。康熙元年,阎尔梅曾到常熟与钱谦益会面。是会中,阎尔梅即席作《钱牧斋招饮池亭谈及国变事恸哭作此志之时同严武伯熊》,诗云:“绛云楼外凿山池,剪烛春宵念昔时。鼎甲高题神庙榜,先朝列刻党人碑。邵侯无奈称瓜叟,沈令何言答妓师?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说不胜悲。”^⑧阎尔梅虽然志节坚刚、义不仕清,但在与仕清者的关系上,并不如何激烈排斥,他与曾救援其脱狱的龚鼎孳的深挚友情就是一例。而钱谦益既有明确的反清赎罪的实际行动,又在感情上对故国有深切的怀恋,至于“谈及国变事恸哭”,这些都不能不令阎尔梅动容。但是,他又不能忘怀钱氏身为失节者的事实,严正地指出他“大节当年轻错过”的节操有亏,而这一谴责又无声地融化于“闲中提说不胜悲”的故国之思、身世之感中,一个“悲”字涵盖

①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三四《秋杪集澹心道归堂时园次自广陵澹心自姑孰至》。

②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二《和答澹心兼寿其五十初度》。

③ (清)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二五《和别澹公》。

④ (清)梁清标:《蕉林诗集》五言律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⑤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73页。

⑥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115页。

⑦ (清)方文:《龛山集》,第1188页。

⑧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了个体生存于这一巨变时代的种种无奈,在出于道义的谴责中,流露出某种指向人性的理解和悲悯。遗民余怀曾有《褚河南书枯树赋歌为孝升作》,是为龚收藏的褚氏遗墨题诗,但需要注意的是,庾信《枯树赋》本身代表的就是贰臣心中一段隐秘的情愫,余怀题此诗,正是暗示龚的贰臣身份。余怀虽然在鼎革后与龚氏仍然往来不绝,但他对龚鼎孳的节操问题却并非没有微辞。他在《板桥杂记》中,曾盛赞龚鼎孳原配妻子童氏拒受清朝诰封之举:“童夫人贤节,过须眉男子多矣!”^①褒贬之意甚明。而为龚氏题咏《枯树赋》遗墨,其皮里阳秋之意,不言而喻。而龚鼎孳肯将此公诸题咏,也是在向遗民们表明他的立场: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大节有亏,接受友人的不满乃至菲薄谴责。

由于名节问题的纠结,也由于社会普遍舆论氛围对“贰臣”的鄙薄,遗民与贰臣交往中尺度的把握,是相当微妙而艰难的。和贰臣往来太过密切,很容易给他人留下自己不够坚持原则、依媚权贵的糟糕印象,这是立身处世特重士论风评的遗民所无法接受的。杜濬是清初江南遗民中的著名人物,因与龚鼎孳往来唱酬密切,熊赐履尚作《与杜于皇书》,对其进行责难与规劝:“士君子立身一差,即万事瓦裂,文不文,又奚足论哉……谓宜先生之予夺严于袞钺,不可以毫发假也。乃细读大集,其中往来赠答与觞词挽章诸作,不无一二归命于当世之达尊,而所谓当世之达尊,则又吾侪之所目为败名丧节、寡廉鲜耻,不足齿于士大夫之列者。薰莸不同器,颜跖不共居,谅先生筹之熟矣!不知何故而复有此荒唐之作也?”^②辞气相当严厉。其责难的矛头一方面指向龚鼎孳“当世之达尊”的显赫政治身份,另一方面也指向他“败名丧节、寡廉鲜耻”的名节弱点。可见当时的士论风评之所向。

在这种舆论氛围中,遗民与贰臣的交往,往往只能定位于一种亲密“有间”、界限分明的状态。顾炎武与贰臣曹溶交情笃厚,《静惕堂诗集》收有曹溶酬赠顾炎武的九题十一首诗,数量相当丰厚。但顾炎武在其诗文中,竟全无一语提到曹溶,也未保留两人唱和的作品。可见他对舆论仍不能无所顾忌。另一遗民许楚“若周亮工龚鼎孳施闰章辈,文采官位,奔走一时,特间与燕游而已,不藉其余荫,人品甚峻”^③。和贰臣友人“间与燕游”的同时,还务必要保持“不藉其余荫”,可谓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明清之际隐遁不仕、却又和众多仕清者有交往的遗民人士申涵光,对于遗民与“故人仕宦者”之间关系的尺度把握,曾经有这样的由衷感叹:“故人仕宦者,贻书见招,以不赴为正。或久别怀想,抵署盘桓数日,欵欵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摇,安有关说?一贵一贱,交每不终,未必尽贵人之过也。”^④需要注意的是,名节问题和舆论风评,在贰臣与遗民的交往中虽然无法回避,却并不构成双方交往的障碍。方文和龚鼎孳的交往就是一例。前者是坚不仕清的遗民,后者是降闯降清、声名不佳的贰臣,但两人的友情颇为深厚,国变之后仍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两人之间的交往,更像是一种各行其志、又互相理解和尊重的纯正友情。以方文《正月十九日龚孝升都宪社集观灯》诗而论,此社集中,龚鼎孳与赵开心是贰臣,严沆、赵而忭、吴绮等是入清后获得功名的新贵,方文是遗民,而陈祚明虽然入清后未仕,行为却颇有奔走权门之“山人”的色彩,堪称是各种政治身份的士人的大聚会,却始终保持着各行其志、其乐融融的和煦气氛。末句云“漫道马牛尘壒里,尚容鸾鹤自为群”^⑤,既自重遗民身份,又不以相交龚氏这样的贰臣为耻。而《历阳道中送龚司寇》也具有

① (清)余怀:《板桥杂记》卷中,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清)熊赐履:《经义斋集》卷一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125页。

④ (清)申涵光:《荆园小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⑤ (清)方文:《蠡山集》,第594页。

相似的意味：“台鼎望诚重，林泉味亦甘。”^①既对龚的立身朝堂寄予厚望，又切合自己的遗民身份。又如《龚孝升总宪以古色轻容褥见惠谢之》：“嘉祝意何厚，深辞惧不恭。南屏霜雪里，披此看岩松。”^②既见己遗民之志，又对龚之馈赠深表诚谢。

此种君子各自有志而又能互相理解尊重的观念，在清初遗民与贰臣的友谊中相当常见。申涵光系山西著名的遗民领袖，与贰臣王崇简有相当深厚的交谊。其父申佳胤得以获谥，王多有力焉。而王崇简亦曾托其代觅田产，以为老之居所，可见两人之亲密无间。而申涵光在《聪山集》中，亦从不讳言他与王的交情。他在《答王祭酒敬哉先生》中写道：“一时麟凤趋天仗，十载禽鱼恋草堂”，“我自孤筇寻涧草，君从双阙咏秋风。”^③其内在意味和方文的“台鼎望诚重，林泉味亦甘”颇有相似之处。

清初的贰臣与遗民，这两个政治道德立场迥异的士人群体，有所往来乃至交谊笃厚的奇特现象，颇可见清初士人心态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侧面。贰臣热衷于结交遗民，是由于失节仕清后的忏悔心理乃至赎罪渴望，在舆论的道德压力下希望获取遗民的谅解，且改善自己的人格形象与舆论处境。对昔日友情的追忆延伸，对明朝故国的怀恋，成为他们和遗民交往的情感交汇点。而忏悔自谴与自惭形秽，则是他们面对遗民友人时应有的立场。而在遗民方面，他们谴责贰臣的失节，对其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在与之往来时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且往往抱有君子各自有志的宽容心态。

On the Mental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rchen and the Ming Adherents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Bai Yijin

Abstract: Erchen who were disloyal to Ming but took the official positions in Qing often were keen to contact with the Ming adherents because they were the atonement for repentance, seeking psychological comfort with the help of loyalists public pressure to improve their own reputation. They seek the same emotional intersections by recalling their former friendship and nostalgia for the Ming of the two sides in their communications, and got the message to maintain the identity and humble confession and position. The Ming adherents had a very complex attitude to them that on one hand to maintain a certain distance by denouncing their disloyalty, on the other hand to have a friendly attitude of tolerance that everyone in his blog.

Key Words: The Early Qing Period; Erchen; Ming Adherents; Communications

[责任编辑:陈宏]

① (清)方文:《禽山集》,第1025页。

② (清)方文:《禽山集》,第585页。

③ (清)申涵光:《聪山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